

★ 亲历者讲述

长征路上的共青团员们

黎光

长征时期,从我们红25军这支队伍的组成和年龄结构看,从军领导到每个战斗成员都十分年轻。连队的战斗员大多是共青团员。我当时在军政治部工作,担任共青团委书记,也只有17岁。

有个名叫匡书华的儿童团员,长征时只有十一二岁,是河南光山县匡家湾人。他有个当红军的堂兄匡占华,在连队担任炊事班长。长征出发前,匡占华回到村里,看到村子被敌人烧光了,就领着弟弟匡书华和六七个走投无路的青少年来当红军。其他几个青少年都补入战斗连队,唯独匡书华年纪小、个子矮,没有被批准入伍,可他就是跟着队伍一步也不离开。长征路上,他跟在哥哥的炊事班,经过千里转战到达陕南。哥哥在陕南牺牲了,他失去了唯一的亲人,炊事班的同志对他更加体贴照顾,帮助他随军继续长征。到陕北以后,领导考虑他跟着部队走了几千里路,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了,尽管年龄小,还是批准他正式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当上了小宣传员。

1934年冬,红25军长征进入陕南。在柞水县的红岩寺镇,有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叫明道和,领着十五六个放牛娃娃跑来参加红军。明道和是皖西人,参加红军较早。1932年冬,他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转战到商洛山中,因病掉队,挨门乞讨来到柞水县的石槽沟口,被一户姓何的农家收留,边帮工边养病。他在何家整整住了两年,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这年腊月间,他听说红25军到了红岩寺,就联系了十五六个跟他一起放过牛的牧童,连夜赶了好几十里山路,找到了红军队伍。见到吴焕先政委时,吴焕先一开始怎么也记不得这个当年的红小鬼。明道和忙说:“吴政委,我听你在队前讲过话哩!你当时说过,我们的红军队伍,好比一把紧紧扎成的大扫把,把敌人扫个落花流水……”吴政委这才恍然大悟,深情地摸着他的头说:“好同志,你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个红军战士,是一根又青又翠的竹子!呵呵,你这根孤孤单单的竹子,不又扎成一把小扫把,领来了一个牧童班吗!”

回顾长征途中的无数次战斗,特别是独树镇和庾家河两次恶战,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广大共青团员和青少年们同全军指战员一起,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用生命的最强音谱写着青春进行曲。

1934年11月26日,我红25军先头部队到达方城独树镇附近,遭敌第40军115旅和骑兵团的堵击……在此关键时刻,吴焕先政委带交通队两个班赶了上来。交通队这两个班多是共青团员,他们奋勇当先动作迅猛,很快就将敌人顶了回去……在这次战斗中,跟随吴政委的交通队两个班发挥了很大作用,为全体指战员所敬佩。

12月10日,部队在庾家河的东山坳口,遭敌60师突袭,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均负重伤……军部司号长、共青团员程玉林下颌负伤不能吹号,就利用一座小庙做掩护,向敌人投出数十枚手榴弹,打退敌人几次冲击。敌人集火力向他射击,他坚持不下火线顽强战斗,最后壮烈牺牲。

1935年8月,当红25军西出秦岭,北过渭河,翻越六盘山,直逼平凉城下时,敌35师师长马鸿宾部以为我们都是些“娃娃兵”,没有放在眼里。他给骑兵团长下令时说:“你是天上飞的老鹰,红军是些地上跑的小兔子,好抓哩!”但就是这支“娃娃兵”,纵横驰骋于陇东高原,截断西(安)兰(州)公路,直捣敌35师的布防区域。坐镇于平凉城内的马鸿宾亲自率部追击,却在马莲滩被打得落花流水,险些被生擒……

1936年,《共产国际》第7卷第3期曾刊载一篇题为《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的文章,以“儿童军”著称的红二十五军就像文章中所讲的:“像雄鹰在那里盘旋一样,使敌人布防于此的雄厚兵力,都惊得心胆俱寒!”

长征路上的共青团员们,个个都是出色的战斗员,又都是很好的宣传员。部队每到一地,以共青团员为主的宣传队、宣传小组立即活跃起来,张贴布告、刷写标语,宣传党的政策,唱歌演戏,搞得热火朝天。

此外,还有一些团员从事卫护工作。我们红25军医院的曾继兰、曹宗凯、田喜兰、余国清、张秀兰、戴觉敏、周少兰(周东屏)7名女护士,人称“七仙女”,她们大都不过十七八岁。

在陕南开革命根据地的日子里,战斗极为频繁紧张。她们每天随军转战,还要救护伤员、照顾病患。这一时期,豫皖皖省委书记徐宝珊患了重病,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身负重伤。她们时常随着3副担架奔跑后忙个不停,十分辛苦。每当打下一座新的县城、乡镇,她们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又要上街宣传演出,又要收购筹集药品,还要安置伤病人员,有时还参加群众工作,没收地主恶霸的财产分配给贫苦群众。军供给部曾把土豪得来的些妇女衣物分给“七仙女”,可她们谁也不穿不用,又转送给贫苦群众。

西征北上途中,从天水附近渡过渭河时,只搞到一条小木船。因为水流湍急,军领导决定让给“七仙女”和几个重伤员乘船过河,部队则攀着牵在河面上的几条白布绳索,把武器弹药顶在头上,徒涉而过。参谋长戴季英从两当县城请了一位照相师,沿途拍下几张珍贵照片。

征途是漫长的,也是坎坷艰难的。共青团支部书记曹宗凯和共青团员曾继兰在长征路上倒了下去,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长征结束后,“七仙女”只剩下5名,她们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作者时任红25军团委书记,文章摘编自《来时的路:亲历者讲述红色故事》“胜利到陕北”卷,有删节)

本版学术支持:褚银



红25军官兵乘木船过渭河。

资料图片

四渡赤水期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

一步步走向胜利

张 馨 张心悦

★ 军史回眸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城。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红军突破乌江,攻占遵义,令蒋介石大为震惊,急调大量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进逼。为摆脱这种被动、危险的局面,毛泽东果断决定,挥师北渡长江,前出川南,与活动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开创川西或川西北革命根据地。四渡赤水战役就此展开。

四渡赤水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中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关键之战。四渡赤水期间先后召开的土城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白沙会议、苟坝会议等,立足红军转战川滇黔的严峻战局,直面敌我力量悬殊、行军转战被动、军事指挥亟待优化的现实困境,层层递进破解长征途中遇到的重大战略、领导指挥、作战方针等关键问题,及时纠正偏差,凝聚思想共识和战斗意志。这一系列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生动实践,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环节。

土城会议

土城是赤水河东岸的重要渡口。夺取土城,对实现渡江北上计划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一渡赤水”前,毛泽东提议,周恩来、朱德等都同意在土城打一仗,阻止敌人的进攻。然而,在青杠坡战斗中,由于情报有误,战至黄昏,红军虽予敌重创,但未能全歼敌人,形成对峙。敌援军逼近,形势危急。1月28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紧急召开会议。毛泽东认为,根据目前情势,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无法实现,必须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

渡赤水河,再相机北渡长江。

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西渡赤水河的命令。4时许,中央红军兵分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南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不到晌午,全军3万多人安全过河。敌人追至河边,面对被炸毁的浮桥,只能隔岸兴叹。

土城会议改变了此前北渡长江的作战计划,及时转换了行军路线。此后,红军实施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在敌数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中穿插迂回,逐步摆脱被动。

“鸡鸣三省”会议

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没有明确分工。1935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川滇黔交界处一个被称为“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会议,即“鸡鸣三省”会议。此次会议根据遵义会议精神,对政治局常委进行适当分工。张闻天接替博古(秦邦宪)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鸡鸣三省”会议的重大意义,在于坚持独立自主决定改变党的领导人,独立自主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样的组织安排,进一步清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扎西会议

由于军情紧急,扎西会议之前,遵义会议精神一直未能在红军官兵中正式传达。1935年2月8日,中共中央在大河滩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土城战斗失利的情况,讨论今后新的行动方针,通过了张闻天根据遵义会议精神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2月9日,军委纵队从大河滩进至扎西镇,10日上午召开会议,张闻天代表党中央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干部们在蒙蒙细雨中仔细聆听,报告传达后还进行了自由发言。这对

总结和吸取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明辨大是大非,统一全党思想,巩固红军,振奋精神,战胜敌人,发挥了重大作用。

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于1935年2月在扎西境内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的统称。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在思想路线和军事路线上的正确性,使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路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扎西会议还研究部署了中央红军的精简缩编。整编后,部队战斗力 and 机动性大为增强。

白沙会议

由于形势严峻,红军频频转移行军路线,经常走“回头路”“兜圈子”。不少红军指战员对此不理解:为什么要走来走去?为什么不不停地改变作战路线?为什么刚走过的路,很快又要掉头回去?这些意见和情绪不解决,必然影响战斗力。

针对这种情况,1935年2月15日至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川南古蔺县白沙场(今双沙镇)召开会议,并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有时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此次会议解开了红军官兵的思想疙瘩。

中央红军不再与敌进行阵地战、堡垒战,不再与敌人无谓地拼消耗。随之而来的是进行广泛的运动战,从被逼无奈的撤退转移到游刃有余的调动穿插,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保存自己。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克遵义城,歼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蒋介石感叹:“这是国军追剿以来的奇耻大辱。”

苟坝会议

遵义会议决定,一切重大军事行动决策都要经过政治局讨论。因此,张闻天时常要召开20余人的会议进行集体决策,这与紧张的行军作战环境极不适应。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也称前敌总指挥)。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20多人参加的会议,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多数人都同意打,只有毛泽东反对。毛泽东认为打鼓新场工事完备,红军远程奔袭攻坚,难以速决,反而会遭敌合围,陷入困境。但毛泽东未能说服大家,会议决定攻打打鼓新场。

当晚,毛泽东独自提着马灯,走到两公里之外的周恩来住处,说服了周恩来,又同周恩来一起到朱德住处,说服了朱德。第二天一早,中央领导人会议再次召开,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耐心说服下,最终取消了进攻打鼓新场计划,使红军避免了一次重大挫折。随后,毛泽东向周恩来建议,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应成立几个人的小组,全权指挥军事。12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

苟坝会议不仅进一步巩固和确立了毛泽东继遵义会议后确定的领导地位,也为实践毛泽东军事思想提供了思想保障和组织保证。

四渡赤水期间,在血与火的战斗间隙,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先后召开的这一系列重要会议,不但决定了长征的方向,解决了党内最紧迫的组织问题和军事指挥问题,也决定了红军的生死存亡和中国革命的兴衰成败。在革命火种庶几熄灭的险境中,有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地球上的“红飘带”才恢复了灵性的舞动,此后更是引导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伟大胜利。

但考虑到航道一旦封锁,市面上已经出现的物价波动会加剧,上海经济将受到重大影响,这个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严酷的事实让扫雷工作更加刻不容缓。然而,时间一天天流逝,扫雷进展并不顺利。官兵在水面上搏击风浪10余天,依然没有清扫出水雷。1950年7月2日,张爱萍做出了暂停扫雷的决定。8月28日,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呈报给周恩来的《长江口扫雷工作报告》中,分析总结了这次扫雷失败的原因,其中第二条明确写道:工具缺乏没有适当之扫雷舰,只以小型的25吨登陆舰代之,结果长江口风浪大、水流急,小船不能工作,没有科学合用之扫雷器具,由职部鱼雷厂造4条扫雷索,均太细不堪使用,拉不动水雷,结果4条扫雷索断了3条。

一边是落后的装备和技术,一边是亟待恢复的上海经济,孙公飞和战友压力很大。就在这时,在党中央、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扫雷大队获得了新型扫雷工具,张爱萍又调来“古田”“枣庄”“周村”“张店”等改装完成的300吨位扫雷舰。

1950年9月,孙公飞率领扫雷大队再次进入“雷海”。9月24日中午,江面上一条扫雷索猛地抖动了一下。扫雷官兵既兴奋又紧张。他们乘坐橡皮艇,小心翼翼地靠近水雷,将绳子绑在锚雷的吊环上,拖到岸边,再交由排爆专家对水雷进行处理。

这一行动证明了扫雷方法的可行性,也鼓舞了扫雷大队官兵。到1950年10月底,敌人布设在吴淞口至长江口的水雷被全部清除,长江航道胜利打通。

后来,孙公飞曾担任海军东海舰队副参谋长、北海舰队参谋长等职。笔者在上海寻访孙公飞的后人时,了解到孙公飞生前一直珍藏着他们执行首次扫雷任务的130余张照片。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人民海军第一支扫雷大队白手起家、劈波斩浪的艰辛历程,孙公飞的女儿把他生前珍藏的130余张照片捐赠给了东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这段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也在一张张老照片中变得更加鲜活可感。

新中国首次海上扫雷作战

常军波

★ 图文军史馆

在东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的军史长廊,有一张拍摄于76年前的照片。照片上,几名乘坐橡皮艇的海军官兵正在小心翼翼地拖拽一枚水雷,水雷的几个“触角”清晰可见。“触角”就是水雷的引信,一旦达到临界压力值,水雷就会爆炸。那么,当时官兵为何会这样操作水雷呢?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国民党军为阻止我军追歼,封锁上海港口,进而从政治上经济上给刚解放的上海造成压力,做出了在长江口布雷这一丧心病狂的举动。

长江口港口、航道众多,船只往来频繁。布设水雷,关闭港口,就等于关闭了通往海外的交通和贸易大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介绍,当时上海的经济具有非常明显的对外依赖性,关系民众生活的重要物资“两白一黑”(“两白”指大米和棉花,“一黑”指煤炭)主要依靠进口。因此,布设水雷对于上海经济建设有很大危害。

对此,党中央及上海市领导都很重视。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长陈毅指示,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保证航道畅通、航行安全,务必尽快把敌人布设在长江口的水雷清除掉,并把这个重要任务交给了组建不久的华东军区海军。

时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张爱萍接到扫雷任务后,立即指示制定打通长江口航道的扫雷作战计划。1950年春,华东军区海军扫雷大队正式成立。原第三野战军教导师参谋长孙公飞任扫雷大队大队长兼政委。海上扫雷不仅极其危险,而且专业



1950年,海军官兵在长江口搜出敌人布设的水雷。

资料图片

性强。刚刚成立的扫雷大队既缺少专业人员,也没有专业的扫雷舰艇,执行这项任务的难度可想而知。在孙公飞的一篇回忆文稿中,这样描述扫雷大队刚组建时的情形:“我们都是由陆军转到海军来的,过去谁都没上过军舰,更没见过水雷是什么样子的。”

为了解决装备问题,华东军区扫雷大队以“中”字号111舰作为指挥舰,把从国民党军缴获来的10艘小型登陆艇改装成了扫雷舰,并开始对扫雷专业技术进行摸索学习。

在长江口水域进行扫雷,从哪里打开突破口?经过反复磋商,扫雷大队把第一次扫雷作战区域选择在长江口九段沙附近。他们将扫雷索等装备投放到水下开始搜索。然而,谁都没想到,

第一天就发生了意外。扫雷官兵正在搜索时,不远处的海面上突然传出一声巨响。原来,外籍商轮“伏虎”号在冒险进入长江口时,触雷了。

对于这次触雷事件,孙公飞后来回忆道:“突然,一声巨响,海面上飞溅起几十丈高的水柱……我立即命令部队停止扫雷、抢救商船。官兵纷纷向落水商船船员扔救生圈,有的干脆跳下海去救人。人是救上来了,可是我们的心却像撞了铅一样的沉重。”

从当时打捞“伏虎”号商船的照片中可以看出,一枚水雷就可以将一艘巨大的商船炸成两截,可以想象水雷的巨大破坏力。

事实上,为了安全考虑,曾有人提议在扫雷的同时,对长江口进行封锁。